

建国以来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朱孟楠, 尤海波, 李 威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文章梳理讨论了我国人口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劳动力供给增加及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当婴儿潮出生的大量人口相继到达退休年龄时,“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与其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即将到来。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的趋势,我国的老龄化同时还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大、增加速度快的特点。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能使经济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文章系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并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升级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 人口红利 老龄化 人口结构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768(2013)04-0008-05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人口结构变化是解释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达到了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总量的既定目标,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转变,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比重持续上升,总抚养系数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增加,高储蓄、高投资以及高增长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退出劳动市场时,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负债,可能使我国经济面临未富先老的境地。先老指适龄劳动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口增多,未富意味着我国目前资本尚不充裕情况下的大量劳动需求。本文将系统分析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历程和未来变化的方向以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一、我国的人口变迁与年龄结构变动

为了系统地探究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需要对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三次婴儿潮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加以梳理。

建国至今,我国历经三次婴儿潮,实现了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转变。人口变迁带来的人口结构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改变,形成“人口红利”。于此同时,老龄化趋势也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一)我国的三次婴儿潮

1.第一次婴儿潮在 1949—1957 年,死亡率大幅降低是这一阶段人口数量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刚成立的新中国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加之社会环境的安定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幅降低。在 1949—1957 年间,总死亡率由 20‰下降至 10.8‰,婴儿死亡率由 195‰降低至 61‰。出生率在这个时期基本保持在 35‰以上的高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6 左右。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对比同时期出生率的稳定上升,形成了我国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潮。由于人口基数小,只有 4 亿,这次婴儿潮新增人口的绝对值较小,每年约 1 700~2 200 万人。实现了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转变。

2.第二次婴儿潮在 1962—1972 年,生育率上升是这一阶段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国民经济状况好转,补偿性生育造成出生率大幅上升,在 1963 年出生率达到 43‰的峰值,其他年份也在 37‰以

【收稿日期】 2013-01-20

【作者简介】 朱孟楠(1963-),男,福建三明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尤海波(1984-),男,河南商丘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李威,男,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微观金融与实证金融。

上。在这十一年中,平均人口出生率为 32.7‰,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 8.8‰,自然增长率高达 23.9‰。与人口高自然增长率相对应的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规模,十年间新增人口约 2.6 亿人,约占目前人口总数的 1/5。其中,1963 年新生人口约为 3 000 万人,其后两年约为 2 700 万人。1965—1971 年间的平均新生人口约为 2 650 万人。与此同时,人口的预期寿命延长到 64 岁。这次是婴儿潮的出生规模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历史上都是最大的,也被称为是主力婴儿潮。

3.第三次婴儿潮在 1986—1990 年,由主力婴儿潮进入婚育年龄所产生,也称回声婴儿潮。其中 1990 年是这个阶段人口出生最多的一年。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降低到 2.3~2.8,出生人口规模虽不及主力婴儿潮,但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 2 400 万,新生人口总数约 1.24 亿,约占目前全国人口的 10%,常用“80 后”来称呼这个群体。这个时期的出生率下降到 19.74‰,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 6.68‰,自然增长率也下降到 13.06‰。可以认为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转变的过渡阶段。

(二)人口变迁造成年龄结构的改变

三次婴儿潮导致人口规模增大,人口年龄构成也相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少年人口比重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老年人口比重略微上升。从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少年人口(0~14 岁)人口比重从 36.3%降低到 16.6%;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比例由 59.3%提高到 74.5%;老年人口(65 岁及以上)比例由 4.4%上升到 8.8%。在少年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大幅下降。人口结构有利的变化,减轻了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

(三)老龄化是我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比重均持续上升。2000 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 岁以上人口比重为 10.46%,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初步迈入老龄化社会。2012 年我国老年人口为 1.94 亿,占人口总数的 14.3%,这一数字还将以异常快的速度上升,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以下特点:

1.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大。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超越欧美等发达国家,比日本略快。我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从 4.9%上升到 7.0%用了 18 年时间。日本老龄化走完同样的过程用了 20 年时间。瑞典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 5.2%上升到 8.4%用了 40 年时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从 7.0%上升到 14%需要 25 年。而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德国等发达国家走完同样的过程大约需要 40—120 年时间。我国老龄化速度快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老年人口基数小;(2)我国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大量人口陆续步入老年;(3)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死亡率下降,人们的预期寿命普遍延长。

中外学者使用不同的预测方法均表明,21 世纪中叶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联合国 2010 年的预测,2030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在将达到 1.9 亿,2050 年将达到 2.33 亿。届时,我国老年人口数目接近美国人口总数,是美国老年人数的 4.4 倍。2050 年我国人口总数比印尼少 0.51 亿,但老年人口数目却比印尼多 1.03 亿。

2.老年抚养比上升速度先慢后快。我国老年抚养比持续提高,而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由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数量巨大,在其未步入老龄之前,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仍较大。我国老年抚养比变化平稳,只在较低的水平上缓慢增长。老年抚养比在 2025 年将达到 20.9%,低于发达国家 33.5%的平均水平,但高于世界 15.9%的平均水平。在婴儿潮出生的人逐渐步入老龄之后,老龄化进程大大加快。到 2050 年,老年抚养比将快速提高至 44.8%,将超过美国 34.7%的水平。尽管如此,未来 30 年我国仍将是劳动力数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总量等于整个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这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口机会窗口”。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经济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个体出于储蓄养老动机,增加储蓄,由此提高储蓄率。

3.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大多数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是在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期完成人口结构的转变。高收入水平意味着资本相对丰富,在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通过生产要素的替代,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资本密集型和劳动节约型产业。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我国的人口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快速转变,相应的老龄化进程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期到来。生产要素禀赋结构还没有实现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来看,我国尚未步入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发展阶段,如果不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可能丧失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转变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等渠道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总人口的增长与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存在差异性。在总抚养比上升阶段,人口经济负担增加,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小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在总抚养比下降阶段,人口经济负担减小,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见,人口结构的转变带来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的相对变化。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劳动人口增加可以增强分工效应,社会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即使在劳动者生产水平不变的假设下,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经济产出水平同比例的上升。

人口结构的变迁改变国民产出中消费和储蓄的占比。人口转变过程包含个人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关系的变化。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个人在中青年工作时为老年退休后的生活储蓄,以平滑其一生的消费,达到效用最大化。数据显示,个体在20~65岁期间,储蓄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如果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这部分储蓄倾向较高的人口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劳动人口的增加,在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提高了劳动者收入,为高储蓄提供了经济基础。另外,抚养人口比重的降低,减轻了家庭抚育和赡养的经济负担,使得家庭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蔡昉等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改变技术进步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其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确定影响。一些观点认为,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会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和吸收新知识速度,导致科技创新能力下降。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可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从而诱发贸易战争。这样将会削弱科技进步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而建立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之上的观点认为,劳动力短缺导致工人成本上升,使得生产部门有动力寻求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进而推动科技进步。还有相近的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这样将导致政府和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更加重视科技和教育的投入,间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长期增长更多的是负面影响。根据欧盟的估算,劳动供给减少对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约为-0.5%,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约为-0.25%。

三、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人口红利”

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适龄劳动人口增加,人口负担持续下降,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结构。在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情况下,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推动经济发展,增加了劳动者收入,提高储蓄率。“人口红利”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口负担减小,劳动力供给增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次较大的人口生育高峰,分别是在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中后期。这三次婴儿潮的新生儿分别在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相继成熟并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人口持续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与此同时,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我国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亿增长到1998年的7亿,2007年的7.7亿。劳动年龄人口上升的同时,人口负担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当人口负担低到50%以下时,“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我国的总抚养比在1988年前后下降到50%以下的水平,2007年下降到37.9%,2012年下降到34.9%。总抚养比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和,其下降主要由少儿抚养比快速下降导致。少儿抚养比由1978年的61.2%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22.2%,老年抚养比由1978年的7.4%缓慢上升到2012年的12.7%。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负担减轻,使得我国具备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

(二)人口结构转变提高储蓄率,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储蓄率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二战以后,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现了快速腾飞。高储蓄率是它们经济起飞前的共同特点,也是解释它们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腾飞之前,以上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例如,日本当时的储蓄率在35%以上,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前的储蓄率都在30%以上。20世纪90年代

后日本在老龄化问题加剧,储蓄率相应呈现下滑趋势,也是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我国就业率较高且经济活动人口比重大,促使社会总储蓄快速上升,储蓄率也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储蓄率的波动较大。1959—1961年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储蓄率的异常波动。在1952—1958年,储蓄率由22.2%上升到42.8%,1962年下降到15.1%。“文化大革命”运动也造成了储蓄率的短期下降。在7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后,储蓄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尽管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储蓄率并不低。我国80年代平均储蓄率约30%,1994年的储蓄率约34%。与60年代日本的情况相似,2012年储蓄率达到52%,为全球第一。

高储蓄率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多数理论和学者从政府引导储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等角度解释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的趋势。这些解释忽略了人口结构变化这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多种因素会影响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例如,个体由于未来不确定性产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城乡二元分割、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流动性约束、实际利率水平、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汪伟(2009)通过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得出结论,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的重要因素。

四、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2010),我国未来40年的人口结构变动将更加显著,其中更为突出的特点是老龄化进程加快。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少儿抚养比继续稳定下降,老年抚养比将快速上升,由此导致总抚养比由下降转为上升趋势。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人口负担持续上升,总抚养比在2030年前后将达到50%。届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消失,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上涨

劳动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长时间内出现了首次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标志着“人口红利”消失拐点的出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万人。在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没有大幅改进的情况下,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将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劳动力的支持,经济增长面临挑战。

(二)人口负担加重,“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伴随老龄化的全面到来,劳动人口负担加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2030年以前的人口负担较轻,特别是在2020年以前,总抚养比在45%以下,是21世纪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2030—2050年,人口负担持续上升,总抚养系数将由50.2%上升到64.4%。此外,适龄劳动人口中通常存在相当数量需要负担的人口,例如,接受教育的人口、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提前退休人口等。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丧失劳动力人口和提前退休人口的数量将增加,使得从业人员的负担加重。如果将需要供养的人口从适龄劳动人口中分离出来,从业人员的负担系数将大大高于总抚养系数,增长速度也快于总抚养系数。如果使用从业人员数量计算得出的负担系数,“人口机会窗口”将更早的关闭。

(三)经济中储蓄率降低,导致投资减少

人口结构变迁将改变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的比重。从公共支出角度看,未来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国民生产中用于养老、医疗和护理的非生产性支出大幅上升,挤出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国民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增速下滑。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为1.94亿,占人口总数的14.3%,这一数字还将以异常快的速度上升,并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Peterson(1999)认为人口老龄化从以下四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医疗支出大幅上升。老年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医疗保健服务,给年轻人带来巨大的医疗支出负担,同时导致高额的保险费用和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2)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劳动力短缺,导致经济状况不断恶化;(3)年轻人的储蓄更少,老年人消耗的储蓄更多,储蓄率降低,不利于资本的积累;(4)社会进步阻力大,人们的工作热情减少,经济因此缺乏活力。Feldstein(1995)的研究表明,私人储蓄减少的60%是由社会保障支出增加造成的。

五、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策略

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需要正视其对经济带来的各种影响,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在“人口红

利”完全消失之前,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合理开发和挖掘现存的“人口红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日益壮大的老年群体,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一)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主要体现在数量占优,而这种优势最终要消失。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既可以预防和应对劳动力缺乏,又可以形成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点。表面上看似是劳动力短缺的“民工荒”,实际上是“技工荒”。随着国内外产品质量和要求的提高,企业用工的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劳动者市场不能满足企业对工人技术的需求,就会出现为劳动力短缺现象。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提高全民基础教育水平来实现。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可以显著改善劳动生产率。有计量分析表明,从事制造业的职工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7%。如果企业的员工学历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改善为高中学历员工,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如果全部改善为大专学历的话,劳动生产率可以继续提高66%。

(二)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我国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较高的储蓄率。随着人口的变迁,人口结构的有利因素即将减弱。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可以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延长低成本劳动力和高储蓄的发展优势。因此,以充分就业为导向的政策,可以使经济增长的目标更有保障。保障数量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充分就业,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口红利”,也可以使劳动者在“干中学”中积累人力资本。

(三)改进养老保障模式

迎接老龄化挑战,既要有积极的应对措施,也要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提供安全保障。我国尚未建立一个有效、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目前城镇养老保障广泛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在发达国家,现收现付制是在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当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普遍到达老龄阶段,这种养老保障制度存在潜在的支付危机,相应的改革方向是完全积累制。由于我国老龄化到来较快,养老保障需要尽快从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度过渡。

(四)为人口自由流动提供制度保障

在老龄化背景下,城市人口的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二、三产业的发展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人口的迁移。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我国尚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短缺。但是,如果城镇化速度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则可能出现大规模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制约经济发展。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严重制约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如果消除这些制度障碍,不仅可以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还能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

(五)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世界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依赖生产率的提高。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矿产、能源等资源的供给对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撑逐渐表现乏力。老龄化趋势使我国慢慢丧失劳动力数量优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禀赋优势已不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尽快推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参考文献】

- [1]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
- [2]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 [3]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和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2-11.
- [4]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4-62.
- [5]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5):15-24.
- [6] 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2-10.
- [7] 柳清锐,金刚.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J].人口与发展,2011(4):39-47.
- [8] 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2009(10):29-52.

(责任编辑 Z 校对 F)